

社會對華人移民生態的態度並不相同，例如，由於澳、新淘金熱爆發和社會發展的不同步，華人移民在澳大利亞業已引起歐洲移民排斥的生態優勢，反而得到紐西蘭的青睞，而同在澳大利亞，白人難以開發的熱帶昆士蘭也為華人移民提供更為自由的營造新生態的機會。

總的來說，此書從移民環境史的視角將傳統研究中地緣位置較為次要的澳、新歷史寫出新意，以全球史視野下多元移民社會的複雜互動機制，回應「生態帝國主義」解釋框架的老問題。對華人移民的再認識，意味着對澳大利亞、紐西蘭史學界綿延至今的民族主義敘事祛魅：澳、新之所以變成新歐洲，其實不光是歐洲人消滅原住民文明的結果，更是因為歐洲移民對其他移民競爭者開展的持續且不擇手段的壓制，這一切最終表現為一種淡化華人存在感的歷史敘事。任何移民群體只要對已經主導政治和暴力資源的人群造成挑戰，都難逃被排斥的命運。因此，本書以一種並不輕鬆的筆觸作結：「對這一點的反思或許值得長期堅持，因為用一種生態威脅的話語將特定移民群體妖魔化的邏輯仍然在我們這個世界不同的角落不時浮現」（頁412）。

囿於篇幅和典型性，本書主要關注華人移民在澳大利亞東部幾個殖民地和紐西蘭南島的活動，並將敘事下線定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澳、新華人移民遭到全面排斥之時，在敘事的時間和空間跨度上仍有較大的拓展空間。即便在澳、新進入「永久性限制華人移民入境的時代」（頁391），考察華人移民如何頂着歐洲移民霸權的壓力、在夾縫中推進新生態的營建，也是有助於突出本書主題的重要內容。此外，本書在回應華人移民研究、生態擴張理論、澳新史學的重要問題之餘，如果能結合研究主題對移民環境史作進一步的評析，將有助於讀者更好地把握本書的定位和學術貢獻。

李星皓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侯深，《無牆之城：美國歷史上的城市與自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400頁。

對於生活在現代的人們來說，城市是人類生活的環境，然而早期的城市史研究卻很少將城市視為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的環境。自城市環境史誕生後，這種情況發生巨大的改變。在喬·塔爾(Joel Tarr)、馬丁·麥樂西(Martin

Melosi)、威廉·克羅農(William Cronon)等學者的開拓之後，經過三十餘年的發展，城市環境史蔚然大觀，幾乎紐約、芝加哥等各個重要的美國城市都擁有自己的環境史傳記，但如何從宏大敘事的角度撰寫一部美國城市及其環境交互作用的歷史，無論對城市史還是環境史研究者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挑戰。我們欣喜地看到此書就這一問題進行很好的嘗試，作者通過宏觀敘述和個案研究相結合的方式，展示自然力量對美國城市形態和個體思想的形塑過程以及美國城市「馴服自然」的嘗試及後果。

此書分為四大部份，共七章。在第一部份《城市書寫》中，作者分別從時間維度、空間維度、思想維度上對美國城市環境史學發展脈絡的梳理。第二部份「增長的城市」聚焦於城市內部，講述城市是如何在環境困局中反覆尋求解決之道，如何在擁擠、罹毒的城市中尋找健康與美麗的。第三部份「擴張的城市」則是書寫在城市與其生態腹地之間，關注城市對其腹地生態的影響，以及生態對城市的形塑與約束。第四部份「城市的思想景觀」則從思想層面考察美國城市環境史的演化。此書以此四個部份為基線，淋漓盡致地展現環境史與思想史之間的歷史對話。

此書的一大創見，在於揭示城市與環境的互動關係，彌補當下研究的不足。生態學和環境史研究興起後，路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率先將城市的歷史織入「其區域地理和生命網路的進化」當中，自然開始成為城市史研究的重要議題。在此基礎上，城市環境史學者將目光投向美國城市存在的各種環境問題，研究內容涵蓋城市垃圾、污水、能源等許多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的城市內部話題。隨着研究的深入，城市環境史開始陷入一種書寫定式：自然是城市發展的被動接受者，乃至城市擴張的受害者，即所謂的衰敗論敘述模式。威廉·克羅農(William Cronon)1991年出版的《自然的大都會：芝加哥與西部的歷史》(*Nature's Metropolis: 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 New York: W. W. Norton, 1991)打破城市的邊界，以大都市芝加哥為例探討城市擴張對其生態腹地(hinterland)的影響，從而為城市環境史打開新局面。但遺憾的是克羅農的興趣轉移到他處，沒有就這個問題繼續深入研究下去。此書可以說是對克羅農的研究的繼續和突破，作者在克羅農跳出芝加哥邊界的基礎上，進一步跳出美國城市環境史研究思維的傳統邊界，並圍繞美國城市與環境之間的三大悖論——即人類追求解放與奴役自然，城市文明的多樣性與日益單一化的人造自然，不斷擴張的城市與日益萎縮的地球——展示美國城市化過程中人與自然的變遷。這在很大程度上彌補過往研究的不足，將城市環境史研究推上一個新的高度。

在強調互動關係的基礎上，本書審視人類對「自然」這一觀念的認知變遷，着重強調自然之於城市的重要性。勞倫斯·亨德爾森 (Lawrence Henderson) 在達爾文的物種進化論基礎上，提出「環境適應論」(the fitness of the environment)：適者生存的理论也適用於環境，在有機物調適自身以適應環境的同時，環境也同樣在改變自己，以期成為最適合生物生存的棲息地。環境本身與生活在其中的生物體都進行着相應的能量與物質的交換。在此書以前，尚未有學者從環境進化的角度來審視城市發展的歷史，此書率先看到自然與城市在進化的大系統中相互依存、相互影響。作者進一步指出，城市環境史研究需率先關注到對城市產生影響，也同時受其影響的廣闊的整體生態系統。城市生態系統具有多元性、層疊性與交替性——城市生態系統既非單一的，也非靜止的；在城市之中，不但共存着若干不同的生態系統，不同歷史時段也有着不同生態系統的更迭。城市生態系統的複雜性和脆弱性與城市文化系統的複雜性和脆弱性息息相關，它們彼此之間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城市的穩定與失序。(頁44)

為了展現城市發展與自然變遷之間的互動關係，本書選取具有典型意義的美國城市作為樣本，分別從城市成長擴張的內部和外部以及彼此的聯結的角度，展示城市環境史中的轉折、演變與思想革新。作者以匹茲堡為例，討論工業城市的發展及其環境問題。匹茲堡是曾經長期污染嚴重但後來又成功轉型發展高科技與教育的鋼鐵之城。但作者的分析沒有在匹茲堡的轉型成功之處便戛然而止，而是進一步深思其「成功」背後的污染轉移鏈條：「解決空氣污染的根本，不在於新技術的發明，而在於燃料從煤向石油的轉換，在於重污染企業向海外的轉移。當這些腹地無法繼續支撐美國城市如匹茲堡的運轉時，未來又將如何？」(頁90)作者的眼光沒有僅僅停留在環境史之內，還進一步探討思想史與環境史的互動——美國的環境規制與政治傳統之間的博弈。作者的研究目力之深、研究風格之嚴謹，可見一斑。

作者還以坎薩斯城的故事為核心，展示城市腹地因城市的需求而發生的生態與社會變遷，以及城市對生態現實的適應，由此揭示城市與自然之間複雜的歷史互動。坎薩斯城崛起於密蘇里河與堪薩斯河의 交匯處，是一個依賴大平原的農牧業所建立的美國中西部都市。鐵路的延展打破了自然的限制，城市的腹地可延伸至鐵路可到達的任何地方。自19世紀下半葉坎薩斯城成為鐵路中心之始，坎薩斯城及周圍的農牧業受到商業資本的青睞，大平原也隨之成為坎薩斯城的腹地。但與克羅農筆下的芝加哥不同的是，在作者講述的坎薩斯城故事中，自然不完全因資本與技術力量的操縱而弱化與消失，自然

作為一種自發的、獨立的力量，以災難的形式展示它的極限，制約城市擴張的野心。在坎薩斯城的故事中，1930年代的塵暴與1951年的洪水迫使這個城市去適應新的生態現實。由此，作者展示城市與腹地間的相互調適，啟示讀者重新審視城市與自然之間糾纏的歷史，是為對克羅農在《自然的大都市》中所建立範式的反思與延展。作者進一步強調，在更高超的技術統禦之下，城市的生態腹地或會延展至全球的各個角落。這一創論在全球化的今日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面對無常又脆弱的自然，我們應儘早盡力地拋下人類中心主義的傲慢，學習如何與之相互依存，如何維持人類世界與自然力量的微妙平衡。

作者以波士頓為例，探討人類試圖馴服自然、按照自己的審美情趣改造第二自然的嘗試。波士頓是美國第一個建立都市公園體系的城市。從運輸「美洲的橫財」的港口，到成為實現「山巔之城」理想的商業與文化中心，再到擁有城市公園體系的生態城市，波士頓向世人展示自然條件對它的種種影響。波士頓的都市公園體系以自然形成的景觀為主體，與美國其他城市公園的自然主義風格(naturalistic)相比，它強調本地地理、植被、動物的自然性(natural)。該體系的另一特點為專業化。專業人士主導公園的設計與管理，使這一體系得以逾越行政區劃的束縛，而無管理懈怠之失。民主的信仰在該公園體系的修建中貫徹始終，因此公園設計者竭力抗拒自然之美為某一社會階層所壟斷的傳統，力圖使它成為全社會所有族群所共有的空間。這些特點令波士頓都市公園體系成為城市自然化的成功案例。

在梳理城市與環境變遷關係的過程中，此書還展現美國社會生態觀念變遷的歷程，並試圖探研人類與自然相處的「最優解」。作者指出，在所有的大城市中，人類的財富與進步，是對自然財富的攫取與轉化，暴力被各個階層與種族施以自然之上。在美國兩百年的城市演化史中，最不受質疑的努力便是對自然邊界的挑戰，但是，最終自然也用它的方式回應人類欲望，重塑人們對其發出挑戰的思維定式。一個城市乃至一個國家必需認識到文明向荒野擴張的邊界，而人們也必須學習「約束的道德」。它強調每個人對他人、對群體的責任，對子孫後代的義務，最終也強調人對自然的尊重與義務。自然之美是多元的、變化的，當人們嘗試用綠色塗抹一切環境之時，他們陷入另一種僵化的傳統。

此書是一部富有思想性與系統性的學術專著，其研究的高度、深度與創新性價值都極其顯著。本書亦有未展開論述的地方。正如作者所言，本書在論述中對內容作出了取捨，因《地震城市》(Joanna L. Dyl, *Seismic City: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San Francisco's 1906 Earthquak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9) 已基本涵蓋自然力量定義、自然災難與技術自信、自然災難發生時人類的行為與反應等議題，作者捨棄對城市面對災難時的脆弱與恐懼的論述（頁21）。但就作者着重敘述的自然觀念演變來說，災害為美國社會帶來的對人與自然關係的警醒是巨大的，重大災害往往是迫使重新審視人與自然的關係的契機。減少災害在坎薩斯城與三藩市城市環境史中的篇幅，在一定程度上弱化讀者對災害在城市思想景觀變革中起到的轉折作用的感知，或許會令讀者產生理解上的偏差與困惑。

侯新竹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

趙晶，《三尺春秋：法史述繹集》，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9年，338頁。

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的趙晶先生，長年研究唐、宋法史，精於考辨唐、宋法律形式的功能定性、承繼源流，以及法典的篇目構造，著有專書與多篇論文，可謂用力極深。《三尺春秋——法史述繹集》作為「繹述前人研究」（〈代序〉頁8）的學術評議彙編，正是作者在法史領域尋求對話、推進既有研究的最佳體現。

本書除序言、附錄以及樓勁與大澤正昭的回應信函外，共分為「學術史述評」、「學術書評」、「讀書心得」三編，一共收錄評議性文章二十篇（其中一篇為未刊稿）。現將書中各編稍作闡述如下：

第一編「學術史述評」的各篇文章以特定命題為中心，將學人前後得出的觀點與爭鳴串聯成主軸明確的「學術史」，進而從中提煉方法論、問題意識、今後課題等具啟發性的學術訊息。值得注意的是，在唐、宋史的六篇文章中（〈中國傳統「公司」形態研究述略〉以清中晚期為主，略去不計），以敦煌吐魯番文書、出土告身、《天聖令》、《至正條格》等新見文獻為主要命題的共有五篇。這提示我們，近來中古法史的熱點議題多是由新文獻「激活」而來；與此相對，基於轉換視角所引導出的學術脈絡僅見於〈譚論中古法制史研究中的「歷史書寫」取徑〉。「新材料」與「新視角」之間，似乎存在一定程度偏重。